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李千 吴明伏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主编:管益忻

副主编:启文 白卫星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第 50 期 (总第 152 期) 2014 年 4 月 19 日 星期六 甲午年 三月二十 投稿邮箱:jixz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5959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由本报组织、举办的中国《2013·经济学人》评选已于日前揭晓,现将评选结果公布于下:

获得中国著名经济学家“2013·经济学人”荣誉称号的经济学家是(排名不分先后)巴曙松,杜润生,程恩富,贾康,林毅夫,宋养琰,肖林,杨培芳,张卓元,郑新立等共十人;获得入围资格的还有(排名不分先后)保育钧,程路,蔡继明,葛守昆,李江帆,刘福垣,刘茂松,马晓河,牛凤瑞,任玉岭,周天勇,张汉亚,张军等十三人,共计 23 人。

《2013·经济学人》评选揭晓

大家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一光辉奋斗历程中,中国的经济学家功不可没,其理论建树为改革、开放,为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给出了重大的无可替代的经济思维引领、智力支撑和理论武装,其重大贡献将

同广大民众光辉业绩一道彪炳史册,辉煌千秋。作为经济学家们的园地和平台,为记录他们的丰功伟绩,《经济学家周报》于 2013 年下半年即开始筹划、组织《2013 经济学人》评选。经专家委员会多次研究、探讨,深入研读诸多经济学大家们的理论、观点和学术著

作,最终形成一致的科学的认定。

这是一次始终本着公开、公平、公正“三公”原则进行的不收任何费用的纯公益性活动。入选的基本条件是三条:

- 其一,原创能力强,学术水平高;
- 其二,理论实践性强,甚具可操作性;

其三,应用时效性强,社会影响力广泛而深远。

大致运作规则是:

- (1)整体评价个别“经济学人”之主要学术理论造诣,而不只是哪一(几)部(篇)论著或哪一(几)个别观点、论点;
 - (2)关照各个学术流派,各个领域。学者:老、中、小兼顾,文论:长、中、短皆宜;
 - (3)不搞“终身制”,一年一届;随时上车,随时下车;
 - (4)人数设定:“年度人物”十名;入围者不超 30 名。
- (“人物”简介将于 5 月 3 日刊登,敬请关注)

中国“经济学人”:从理论视角引领中国经济运行发展的时代旗手——写在《2013·经济学人》评选活动揭晓之际

自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此 30 余年国家发展过程中,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学家为促进改革开放理论发展和中国经济建设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记载、铭刻和褒扬那些为国家改革、建设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贡献,特别是激励、记录和奖挹中国经济学家在未来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上取得更加超前、科学、管用的理论探索、研究成果和学术建树,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这里我们郑重地以获得本届“2013·经济学人”称号的 10 位经济学家为主,将相关经济学家的主要理论观点和学术建树作一阐述,以飨读者。

一、积极应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实践需要,给出了一系列引擎性理论元素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同时,科学整合世界各先进经济理论,紧密耦合中国广大民众实际需要,原创性地给出了一系列引擎性理论元素,这些导向性新视点、新思维、新思路、新设计,引领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不断向前演进。

★在改革认识论定位上,把对改革朴素认识上升为科学改革观的理论元素。

著名经济学家宋养琰教授的《我的改革观》在对改革开放总体认识把握上,给出了一个完备改革发展观。他全方位、大视野、宽领地揭示与阐述道:改革和革命一样,为的都是解放生产力;再者,改革的本质特征是实现“权利的回归”,是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的问题;第三,政府改革是实现政府权力的“减肥”和“瘦身”;第四,政府既是改革的领导者、策划者,也是改革的对象;第五,改革的成败关键在政府;第六,体制改革主要涵盖两方面: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难啃的骨头,难啃的骨头也要啃;第七,(在分配体制上)“替代支付制”是旧的分配体制的致命弱点。

★在基本国情认定上,把潜在优势变为竞争优势的理论元素。

在这方面,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乃至其新结构经济学体系是更为突出的,它从引擎性视角和前卫性思维作出了重要贡献。林教授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体系回答了为何成功的经济体均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为何都是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以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出发点,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那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提出“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六个步骤的框架。新结构经济学以发展中国自身为参照系,注重自身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克服了前两波发展理论一直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的致命缺点。

★在发展模式认定上,把出口导向变为内需导向的理论元素。

中国整个经济发展从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传统发展模式向新的扩大内需、分配向民众倾斜为主要特征模式过渡的理论引导改革开放。经济学家周天勇教授指出:消费与投资严重失衡,居民消费需求始终增长乏力,根本问题在于原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没有能够真正向大部分国民倾斜,过多的资源流向于政策性、国有垄断性行业企业,广大中小企业、市民和农民没有能够真正参与到国民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中。在这样的背景下,鼓励创业、鼓励创新,推进新型城市化和更高层次对外开放,才能使我国经济获得新的增长点,从而继续实现高速、稳定和健康的经济增长势头。

★在经济运行主导机制认定上,把政府

主导运行变为市场决定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理论元素。

中国经济学家们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深刻地揭示和阐明了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引领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著名经济学家郑新立教授的学术观点具有代表性地指出,我国经济具有巨大发展潜力,这特别要求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予以发挥。同时他认为,释放经济增长潜力,近期应以扩内需、调结构,实现稳增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把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引导到有利于促进结构优化的投资领域,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在扩内需转方式中实现稳增长。

★在社会生产力认定上,把单一物质生产力变为同时更兼顾信息生产力的理论元素。

作为世界 20 世纪经济发展大事件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不断推向前进的。因此,信息经济理论、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和推出,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关注的一大领域。他们大力推进中国的传统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这就不能不提及著名经济学家杨培芳教授的理论探讨,他认为信息生产力为标志的新信息时代,传统的价值观都已经出现锈蚀,工业时代的封闭和垄断与新阶段的开放和透明出现冲突,这时候公共市场经济体系的重新构建将成为必然。在“信息社会 50 人论坛”中,杨培芳教授首次提出了“信息生产力”概念,并初步建构起了科学、完备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

★在计划与市场关系认定上,把一般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变为给出整体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之路的理论元素。

众所周知,围绕计划与市场关系长期的曲折的经济实践与理论探索,终于在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下来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显然,1992 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作为总设计师的最终敲定的这一方向,是以广大经济学人长期艰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探索为根据的。

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教授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重要主攻方向在于,他较集中地致力于社会主义价格改革理论与市场问题研究,他紧紧地抓住价格改革的难点和主要矛盾,在如何处理好理顺价格关系和稳定物价水平的关系,给出了深刻的解读。其一,排除通货膨胀的干扰是理顺价格关系的重要条件;其二,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实现从行政定价体制到市场定价体制的过渡;其三,年物价上涨率应以年平均利息率作为最后警戒线,概而言之,以市场发育程度作为划分经济体制改革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供略大于需的买方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等。他积极倡导重视社会主义流通问题的研究并正在着手建立社会主义流通经济学,已取得初步成果。

★在经济增长转升周期认定上,把既往增长周期转升到新一轮增长周期的理论元素。

今天,在大转型之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如何从前一轮增长周期转变为新一轮增长周期,中国经济学人们指出: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程度,以及内生性技术进步的动力转换速度。唯有当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常态,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有序转化为民生福利,达至“物价不涨工资涨”、“底线安全有保障”之际,中国经济才有望在提高系统性免疫力的同时,迎来新一轮增长周期。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要在更高层级上启动新一轮增长周期,亟须在去杠杆化的同时,以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及配套的政府管理体制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行为空间受到切实保护,让政府规制真正成为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切实保障。要提高经济的系统性免疫能力,既要对经济肌体进行全面体检,找出病灶,更有赖于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切实化解民营资本发展的瓶颈,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国目前已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尽管有其合理性,但投资结构不合理与投资效率低是两大弊

病。另一方面,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为了使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须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二、积极深入实际,以创新理论武装广大民众的改革开放实践

在中国党、政府和广大民众践行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中,长年奋力拼搏、笔耕不辍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不断以易懂、可行和有效理论武装着广大民众向前迈进。

★在经济理论知识开掘与普及上,从政治经济学 ABC 到最新理论的多层面、多元化的理论武装。

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首创政治经济学“五过程法”新体系,阐明政治经济学变革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同时,独自创新地提出和阐明了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等理论观点,以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着改革、开放中的广大民众。

★在投资与消费关系把握上,从市场营运到投资方面的多视角理论武装。

经济学家们研究及其系统地揭示和阐述了投资理论的新探索:投资增长快——基础设施等增长快,消费增长快的内在联系,对理性投资同房地产关系揭开了内在关联。在投资方面,经济学家张汉亚教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指出:我国近些年投资率不断升高是因为投资增长一直快于消费的增长造成的(这是简单的数学问题);我国的消费每年都比 GDP 增长快 3—5 个百分点,而且缺乏新的消费热点。因此不能简单、笼统地说是投资挤了消费。

★在三农改革与发展上,从最初农村改革到“包”字进城到总体改革实践指导的理论武装。

(下转 02)

中国经济发展的展望

■ 成思危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首先,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性,根据我们做的一些分析,在 1986 年以前基本上是五年一个周期,以后基本上是十年一个周期,这个周期是从去年开始的,大概要到 2023 年结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经济周期是一个中高速、波动性比较大的周期。第二个周期是从 2002 年到 2012 年,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周期,这个周期应该是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周期。

李克强总理也讲了,所谓稳定增长就是保住增长的下限,控制增长的上线,所以在这个周期里面,大体上我们会平稳的保持在 7%—8% 的增长。但是既然是周期,它也会有上升和下降的阶段,我们做了一个分析预测,大概是这个周期的高点可能是 2019 年,在 2019 年可能达到 9% 的增速,但是 2019 年以后,大概增速会下降。为什么说最高点在 2019 年呢?主要几个原因。

- 1、三中全会的决定逐步的落实,国家的经济转型取得一定的成绩。
- 2、主要领导人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也树立了更强的治国理政的能力。
- 3、2018 年是我们国家的换届年,一大批新的年轻干部上来,他们也会更努力地去发展经济,努力地去工作,所以我个人估计 2019 年可能会是一个顶峰。

但是 2019 年以后,经济会逐渐往下走,这也是正常现象,因为一个是我们的基数大

了,2019 年我们基本上接近 GDP 翻两番的目标,基数大了。二是国家的经济环境估计现在是恢复国际经济环境也是有一个变化,那个时候的国家经济环境可能又是处在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环境下。

所以到 2023 年我们可能的增速可能在 7%,甚至 7% 多一点,整个的增速在 7%—8% 之间,但是 2023 年以后,我个人的感觉可能再下一个周期,就会是 6%—7% 这样的范围内。当然我说预测总是测不准的,测准了就是神仙了,但是没有预测万万不能的,因为你对方没有一个估计,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十年经济我们大体是这么一个展望。

当前看到我们 10 年内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最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环境

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它的严重性,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上一个周期我们的高速发展,实际上超过了我们自己潜在的能力,所以这样就带来了很多环境的债务,什么意思呢?我们做过两次环境成本的计算,一次是 2005 年,由于能源效率低,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我们造成的损失相当于 GDP 的 13.5%,而当年我们的 GDP 只增长了 10.4%。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 2010 年的环境成本的计算。2010 年的环境成本占 GDP 的 12.5% 左右,虽然有所降低,但是还是高于当年 GDP 的增长。环境成本高于 GDP 的增长实际上对

环境负债,这个债虽然是隐型的,可能会传递很长时间,会影响到我们子孙后代,这样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的雾霾天气等等,可以说是大自然、环境对我们的报复。

恩格斯在 1886 年早就说过:“人们不可以过度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的胜利大自然都报复我们。”但是这句话很多人都没有听。一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雷切尔·卡逊生了《寂静的春天》指出农药对环境的危害,以后不断的有这种文件发表,所以上个世纪 80 年代联合国才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真正落实那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十年最大的挑战就是环境,也就是这十年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来改善我们的环境,降低我们的环境成本,这是给人民群众最基本的一个民生问题。有人说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你就算有一亿的财产,健康都没有了,其他都没有。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保证环境质量,降低环境成本,可能是我们最应该关心的事情。

但是这个很不容易,中央很重视,下了决心,也是拿出了相当一部分财力来应付这个问题,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一天能解决的。因为要解决北京的雾霾问题,你就得解决能源结构的改变,减少煤的应用,增加天然气、石油,当然天然气、石油业有限,你要增加新能源的利用。但是从我们国家来看,现在煤占整个比例的 70%,天然气、石油占 20%,尽管我们有一个很雄心勃勃的新能源计划,可以说是尽量推进新能源,但是因为我们国



家太大,所以即使到 2020 年,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也只有从 90% 左右下降到 85%,所以形势很严峻。尽管我们风能接近 1 亿千瓦的装机能力,太阳能我们到明年按计划要到 3500 万千瓦,水能 2020 年到 3 亿千瓦,还有核能可能要到 5000—6000 万千瓦,即使是这样我们基数太大,而且我们还要发展。

根据我们中国能源结构的弹性系数,大概是 0.7,就是你要保证 7% 的增长速度的话,你要 4.9%,就是将近 5% 的能源增长速度,所以这种情况下认真的调整能源结构是治本之策。

我们要减少汽车对环境的污染,尽管我们尽量想办法限制汽车的增长,但是汽车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它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提高的,你可以限制,但是它还是在增长,北京的情况比较的突出。反过来说就是要提高燃油的标准,提高油的标准。我们原来汽车的柴油是国一标准,硫含量是 500 个 PPM,按照国外欧美的标准是 10 个 PPM,也就是我们一辆车排放量是人家 50 辆车的成本,当然提高标准就要提高成本,这个成本主要让生态负担,那我们的消费者也要负担,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把污染问题解决。

当然还有我们全社会的生活习惯,这些就不多说了,所以我认为这十年里,我们对环境能不能解决好环境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和对政府最大的一个考验。相对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是更重要的。

(下转 02)